

明遺民與仕清漢官之交往

李 瑄*

摘要

明遺民很難避免與仕清官員的交往。以往的情誼，現實生活的需要，都帶來難以迴避的人情往還。仕清官員往往主動為遺民提供一些必須的幫助；一些雙方共同關注的事業，如史志的修撰、儒學義理的討論，亦成為雙方交往的橋樑。

雖然各種野史筆記中充斥著遺民痛斥變節者的快言快語，但這些可以給人們帶來道德情感滿足的事蹟卻有不少經不起推敲，很可能來自好事者的風傳。考察遺民對仕清官員的道德評判，可以看到他們對不同價值追求的理解。總的來說，曾在明朝為官而降清的「貳臣」最為人鄙棄，而沒有在明朝任職經歷者比較容易得到寬容。一些仕清者在社會動盪之時撫恤生民的現實功績，更贏得了許多遺民的讚美和支持。

不過，仕清者也確實有為清廷政治穩定打算，同化遺民政治立場的傾向；而遺民與仕清官員的交往則給他們帶來了很大的輿論壓力。

關鍵詞：明遺民、貳臣、清代、顧炎武、方文、魏禧

一、引言

明遺民以不仕清廷為立身之基，政治立場是人們辨別其身分最重要的依據。除了那些從事反清復明活動的人，大多數明遺民對清廷的態度可以簡單概括為消極的不認同、不合作。但是，在清廷與遺民之間，卻有一個模糊相

收稿日期：2007年6月12日，通過刊登日期：2008年4月23日。

* 作者係四川大學中國民俗文化研究所講師。

交的地帶，那就是與遺民保持著私人交往的仕清漢官。

人們在敘述遺民事蹟時，往往會強化他們對仕清官員的棄絕，以此作為其品格高峻、節操堅定的有力證明。但真正深入明遺民的生活狀態，會發現事情不是這樣簡單和鮮明。在現存的清初文人別集中，留下了大量材料表明，遺民與仕清官員的交往是非常普遍的；甚至那些以孤絕著名者，也很難完全避免這種交往。作為生活於現實社會複雜因緣中的人，遺民與仕清者的關係無法像二者的政治立場一樣單純。

這種敏感的交往牽涉到一些複雜的問題，比如明遺民對仕清者的真實態度。遺民的道德追求是與政治立場密切相關聯的，那麼他們如何對那些由明入清卻出仕了異族政權的人進行道德評判？再如交往給遺民帶來的輿論壓力。一些遺民因為和官員的密切關係而為「清議」所非，數百年後仍遭人詬斥。極重身後名的遺民如何抗衡「清議所冤，萬古無反案」的巨大壓力？本文關注的，是那些在一兩條簡單的是非評判標準下生存，卻有著多層次需求的明遺民的真實生活狀態：他們與仕清官員的交往恰好是一個便於透視其豐富意蘊的視角。

二、由各種需求引起的交往

在明遺民事蹟的敘述中，他們對仕清者的態度很受關注。翻開各類遺民傳記，可以發現其對仕清者的棄絕是備受撰述者青眼的一種類型事件。一些極端的行為，亦被視作潔身自好的典範而津津樂道。黃宗羲（1610-1695）在為浙江遺民汪灝所作墓誌銘中寫道：

當是時湖上有三高士之名，皆孝廉之不赴公車者，魏美其一焉。當事亦甚重之。監司盧公尤下士，一日值魏美於僧舍，問：「汪孝廉何在？」魏美應曰：「適在此，今已去矣！」盧公然之，不知應者之即魏美也。盧公遣人通殷勤於三高士者，置酒湖船，以世外之禮相見。其二人幅巾抗禮，盧公相得甚歡，唯魏美不至為恨事。已知其在孤山，放船就之；魏美終排牆遁去。¹

這位遺民先生百計千方的迴避令人感到有趣，誑語時不拘形跡的機智頗具名

1 清·黃宗羲，〈汪魏美先生墓誌銘〉，《黃宗羲全集》第10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頁392-393。

士派，而最後迫於無奈的「排牆遁去」居然帶上了些許傳奇色彩。與之類似，《皇明遺民傳》記李傲機爲了躲避求見的顯官，「躍入江中，俟其去乃出」，²也同樣在滿足人們閱讀遺民事蹟的期待之外，尚有超出預期強度的刺激。

對遺民來說，拒絕與仕清官員的私人交往可以看作一種政治立場的表達，它表示不願與清廷有任何瓜葛；相同的政治立場是與人交往的首要條件，爲此他們有時甚至可以放棄與舊友的情誼。在多數人眼裏，這是衡量遺民節操高下最容易把握的標準：明遺民與清廷政治對立，而仕清者卻要維護清廷的統治，所謂道不同不相爲謀；清廷一方處於政治強勢，爲避免對方的影響，斷絕往來似乎是更乾淨徹底的辦法；另外，道德純粹者總應該潔身自好，與名利場中人往來難免令人懷疑其有所圖。

但實際上，明遺民卻不可能完全斷絕與當世官員的往來。當時以貞介絕俗而致譽天下，稱爲「海內三遺民」者的沈壽民（1607-1665）、徐枋（1622-1694）與巢鳴盛（1611-1680），³是三位最刻苦自閉的遺民。不過即使是他們，也都留下了一些與仕清官員交往的痕跡。

沈壽民《姑山遺集》中保存的書信，表明他與幾位官員的聯繫。其中大部分是給施閏章的。施閏章（1618-1683），字尙白，宣城人，清順治六年（1649）進士。歷任清刑部主事、山東學政、江西參議等職。明亡以前，沈壽民是宣城名士，青年施閏章曾拜其門下。明亡以後，二人出處殊途，但一直保持著情感的親近。施閏章《學餘堂文集》中有向沈壽民絮言生活瑣細、情志寄託的信件；沈壽民所寄，既有贊其文采瑰璋者，感其周濟寒友、急人之難者，亦有勉其撫恤人民、施以仁政者，還有爲自家先隴被人占取而求其

2 《皇明遺民傳》，卷1，謝正光、范金民編，《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5），頁309。

3 清·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卷45：「先生（徐枋）與宣城沈壽民、嘉興巢鳴盛，稱海內三遺民。」見《清代傳記叢刊》（臺北：明文書局，1985），第193冊，頁564。杜濬：「於並世人獨重宣城沈壽民、吳中徐枋，自媿不如。」見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501，〈遺逸傳〉，頁13859。徐枋，〈致巢孝廉端明書〉書後云：「時天下稱遺民之中有同調者三人：則宣城沈徵君眉生，嘉興孝廉端明及余不佞也。」清·徐枋，《居易堂集》（《四部叢刊三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1936），卷3，頁2b。

援手。⁴從這些書信來看，他們的師生情誼並未因政治立場不同而割斷。雖然沈壽民將郡守所贈之金「度置壁中，三年塵甑，未嘗一發視」。⁵對於施閏章給遺民們的種種幫助，如鐫刻遺文、贍養遺孤、周全危難，卻贊為「自微愚山，今竟不古若矣。」⁶

徐枋《居易堂集》中沒有與清廷官員往還的紀錄，清初流傳著「人傳徐昭法，可聞不可見」之語，⁷他閉門謝客的事蹟在當世最為人稱道。黃容《明遺民錄》云：「湯荊峴尚書斌撫吳時，屏驪從訪之山中，避不出，亦不報謝。」⁸其後徐枋所有的傳記都引述了此事。湯斌（1607-1687），別號荊峴，清初理學名臣，以清廉剛正著名於順、康兩朝。他是孫奇逢（1584-1675）的入室弟子，與遺民群體十分親近，黃宗羲、顧炎武、李清等皆與之有交誼。清末陳去病認為，湯斌與徐枋也曾經是有過交往的。在《五石脂》中，他談到曾見過友人所藏湯斌致徐枋的書信，並全文抄錄下來。一信為請徐枋鑒定黃道周遺書法帖並題跋；一信云：「前讀大作〈孤兒行〉，深見忠厚惓惓之意。謹和制一章，言辭蕪劣，不可云詩，弄斧班門，殊用自慙。」⁹從信的內容來看，二人交誼應當不淺。¹⁰

4 見清·沈壽民，《姑山遺集》，《四庫禁燬書叢刊》（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集部第119冊，卷4、卷5〈答施尚白書〉，頁67、79；卷24〈復施尚白〉、〈與施愚山〉，頁274、278；卷25〈復施愚山〉，頁281-282。

5 黃宗羲，〈徵君沈耕岩先生墓誌銘〉，《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383。

6 清·沈壽民，〈與施愚山〉，《姑山遺集》，卷24，頁278。

7 黃宗羲，〈與徐昭法〉，《黃宗羲全集》第11冊，頁251。

8 《明遺民錄彙輯》，頁540。

9 陳去病，《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頁305。

10 羅振玉，《徐俟齋先生年譜》〈序〉云：「湯文正公訪先生於澗上一事，言之當日踰垣以避，兩賢未嘗識面。卓氏《明遺民詩集》、《宋中丞自訂年譜》與《文正年譜》所載甚明。卓、宋與先生同時，所記必得其實，而《嘯亭雜錄》乃云文正訪先生，久乃得見，食以粗糲，文正不敢不飽。至嘉道間有偽為文正與先生書劄者，極道相見之歡。夫據傳聞以致記載失實，此失之無心也，偽劄之作則誣高賢而惑後世，其罪莫可道矣。」見《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9），第75冊，頁396。陳去病所見是否為嘉道間偽作，現已無法斷定；然而陳去病認為徐、湯交往，亦據徐山民所藏湯氏致徐枋書。徐山民即乾隆、嘉慶時翰林院待詔徐達源，為徐枋族裔。他欽慕徐枋之介節，是其澗上祠堂的建築者、文集的刊刻者，對徐枋事蹟亦當知之甚詳。除非這些書信均為偽作，才能如羅振玉斷言。不過羅於清亡後作俟齋年譜，本有意寄託自身遭老之志。其力辨二人未見、高賢被誣，恐亦有自澆塊壘之意。

巢鳴盛（1611-1680）有《永思草堂集》，黃虞稷《千頃堂書目》卷27著錄，今不傳，唯朱彝尊《明詩綜》錄〈題匏杯〉一首存世。其事蹟今可知者甚少，朱彝尊《曝書亭集》卷75〈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云其與落職歸田、「自處仕隱之間」的清伏羌知縣蔣氏「酬酢靡間」。¹¹巢鳴盛是否與在職的清朝官員有過交往已不得而知，但此則材料至少表明，「仕清」並不成爲巢鳴盛選擇交往對象時必然排斥的條件。

上述「海內三遺民」的作爲自然不足以推證明遺民都與當世官員有所交往，卻可以說明政治立場很難完全阻隔仕、隱者之間的聯繫。「不交當世」作爲顯現高潔者道德純粹的傳奇固然令人仰慕，卻抹煞了現世生活的複雜性。生活中還存在一些與政治立場距離較遠的關係，比如親友之間的情誼不可能因易代而全部割斷，雙方共同參與的某個事業也可能把他們聯繫起來。

遺民與仕清者的關係主要是私人交往，亡國以前的情誼常常會成爲聯結他們的紐帶，例如遺民詩人方文（1612-1696）與仕清詩人宋琬。順治五年（1648），方文致書已經入仕清朝的宋琬說：「乾坤納納幾人存，出處雖殊心不易。初冬擬棹吳門來，君舟此際開未開？」¹²二人國變前就是知交好友，乙酉年（順治二年，1645）曾一道避難，同爲「條報楚師轟漢口，又傳戎馬逼江干」¹³而擔憂。後來雖然出處不同，可是患難與共的情誼，仍使方文對這一份友誼十分珍惜。

生活中一些具體需要也會帶來新的交往，如顧炎武（1613-1682）與華陰縣令遲維城。他們本不相識，大約在康熙十八年（1679）顧炎武寓居華陰前後開始交往。顧炎武有意營建朱子祠堂及書院，遲作爲地方官首先表示支持，先「捐俸百金」；¹⁴後來顧生病，遲就承擔起建祠的主要工作。顧炎武對此極爲感激，〈答遲屏萬（維城字屏萬）〉云：「老年臺尊儒誨學之意，勤矣至矣！下令于流水之原，又可識蒞事之精敏矣。」¹⁵

11 清·朱彝尊，〈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曝書亭集》，卷75，《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頁7b。

12 清·方文，〈齊介人書至云宋玉叔客吳門念予甚切感而有作〉，《蠡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頁141。

13 清·方文，〈送吳錦雯、沈冠東、宋玉叔東行〉，《蠡山集》，頁316。

14 清·顧炎武，〈與李中孚〉，《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80。

15 顧炎武，〈答遲屏萬〉，《顧亭林詩文集》，頁192。

仕清者常常為遺民提供一些必須的幫助。顧炎武曾兩度蒙難，第一次是順治十二年（1655）為里豪葉方恒和叛奴陸恩的女婿陷害，對方以「以千金賄太守求殺先生，不繫訟曹而即繫之奴之家，危甚。」所幸炎武好友路澤博「識兵備使者，乃為愬之，始得移訊松江，而事解。」¹⁶第二次是康熙七年（1668），顧炎武被牽連進《啓禎集》案中，下濟南獄。為了營救他，李因篤「三千里赴友人之急，疾呼輦上，協計橐籥」，¹⁷其所「疾呼」的「輦上」之士，即為京中顯貴。其間轉托書信的李源亦清廷官員，順治三年丙戌（1646）進士，曾任河津令，與顧炎武交好；顧炎武的外甥徐元文此時已經做了國子監祭酒，並為皇帝的經筵講官，他也為此案到了濟南。顧炎武在給徐乾學的信中說「公肅之來，正當其時」，¹⁸可見結案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借助外甥的勢力。兩次脫險，無論是「兵備使者」還是親友的幫助，對於顧炎武來說，都是必不可少的。明遺民因為反清活動或者文字而陷獄，在清初是常有的事，此時仕清者的援手往往能起關鍵作用，恰如方其義對陳名夏所說：「獨念天下初定，叛服靡常，保全善類，責在於公。」¹⁹

龔鼎孳（1615-1673）大概是為「保全善類」努力最多的仕清官員。他曾因此被順治帝斥責為「不思盡忠圖報，乃偏執市恩」。²⁰翻閱明遺民傳記資料，往往在生死關頭看見他。如順治十一年（1654）傅山下太原郡獄，作為清廷左都御史龔鼎孳「力救之。事白，釋歸。」²¹康熙三年任刑部尚書，他又設法營救了閻爾梅（1606-1679）。閻爾梅所犯何案已不可知，大抵與其抗清活動有關，或者還有詩文觸禁的可能，據鄧之誠云：「（閻爾梅）被逮時，其弟爾羹父子同下江寧獄，經年始釋。亡命之先，妻妾自殺。慮發塚，預平先墓。」²²大約案情相當嚴重。他最後能夠獲得平安，全仗龔鼎孳出

16 清·全祖望，〈亭林先生神道表〉，《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229。

17 顧炎武，〈與人書〉，《顧亭林詩文集》，頁202。

18 顧炎武，〈與原一甥〉，《顧亭林詩文集》，頁203。徐元文，字公肅。

19 清·錢澄之，〈前處士方公次公直之墓表〉，《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卷24，頁468。

20 《清世祖實錄》卷94，《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影印本），第3冊，頁740。

21 〈傅山年譜〉，清·傅山，《霜紅龕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附錄，頁1313。

22 鄧之誠，《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1，頁89。

力。方文詠其事云：「隱匿姓名之四方，踏遍西南好山水。二十年間頭白矣。司寇龔公念舊交，特疏令君還故里。」²³龔鼎孳被金堡贊為「濟世愛民，是慈悲大菩薩」，²⁴被錢澄之稱為「仁人」，云其：「惟時大獄頻興，無辜坐死者比比，公務於萬死之中求其一生。」²⁵可見其所保全者遠非一二之數。

對於龔鼎孳把自己從危難之中解救出來，閻爾梅是很感激的，〈廬郡夏秋詩為龔孝升作〉寫了二十八首，其中說：「自解山東網，漁樵路始寬。百年知己（己）淚，一粒返魂丹。作客還驚座，逢場更弄丸。待君襄大事，重製遠遊冠。」「高山與流水，嗚咽感知音。」²⁶不但充分體會他對自己的幫助，不啻「返魂丹」，而且有與之相約江湖之興，「知己」、「知音」之言，發自肺腑。

由於遺民生活的窮困窘迫，仕清者往往為他們料理身後之事。降清的明臣中，曹溶是與遺民接觸很多，常常慷慨相助的人之一。錢澄之〈寄曹秋岳司農問素臣後事〉說：「當湖志士君宗彥（謂素臣），久客天南事已非。亂日去留家是累，別來生死願都違。十年消息憑誰問，萬里妻孥仗汝歸（素臣死嶺外，聞公挈其家還里）。自識門庭零落甚，遺孤此外更何依？」²⁷此「素臣」生平不詳，錢澄之《藏山閣詩存》中己丑年（順治六年，1649）有〈同曹素臣入羊城紀事〉一首，再結合這首詩來看，應當是與他一道參與永曆朝抗清的志士。「萬里妻孥仗汝歸」，「遺孤此外更何依」，即云他死後，家人全依仗曹溶的照料。

周亮工也做過不少類似的事。周亮工（1613-1672），明崇禎十三年進士，任山東濰縣縣令，北京失陷後投繯求死，為家人救免；南奔至弘光朝，被誣為「從逆」下獄。順治二年清軍南下時以兩淮鹽運使起用。王若先〈櫟下先生小傳〉言其「營盛于斯、陸可三、林古度、林雲鳳、陳鴻、趙珣之

23 清·方文，〈贈閻古古丈〉，《盦山集》，頁972。

24 釋今釋，〈人日龔芝麓、鄧孝威、張登子垂訪海幢寺奉和〉附題記，清·鄧漢儀，《詩觀》，卷5，《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冊，頁383。

25 清·錢澄之，〈龔端毅蘄水縣生祠重新碑記〉，《田間文集》，卷11，頁197-198。

26 清·閻爾梅，《白菴山人詩集》，卷5，《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9冊，頁430、431。

27 清·錢澄之，〈寄曹秋岳司農問素臣後事〉，《田間詩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卷17，頁361。

葬」。²⁸ 諸人生平不盡可考，但林古度是著名的遺民詩人，林雲鳳遺事見於黃宗羲《思舊錄》，亦為遺民。王若先又云周亮工為南昌王猷定刊刻遺稿，彭士望〈與黃復仲書〉也提到此事說：「公不忍敝鄉王于一遺稿湮沒，特為版行。」²⁹

遺民固窮守志，有時孤處一隅，不為人所知，如果沒有人表彰，他們心血鑄就的著作詩文很可能就湮沒無聞了，仕清者往往自覺承擔了這個責任。魏禧（1624-1681）贊周亮工云：「仕宦既顯，……名日益高，而服官退食，手未嘗釋卷。延見布衣之士，相與諮詢……獎譽之，不問其老穉貴賤，大都僻邑，未謀面未通名氏之人。」³⁰ 吳嘉紀（1618-1685）就是因他的褒獎而獲得世人關注的人之一。周在浚〈先大夫行述〉云：「海陵吳野人（吳嘉紀號野人）苦吟海濱，貧病幾死，鄉里相率為揶揄，先大夫版行其詩，自是人知有海陵詩人吳野人。」³¹ 吳嘉紀也有詩云：「櫟公（周亮工號櫟園）不覺搔首語：『世有此君胡未聞？』索詩一讀一長歎……貧病故人得知己；即遣蒼頭走風雨，陋軒半夜扶予起。跋涉舟車三百程，指日追隨公杖履。」³² 他的詩歌在當世受到重視，後來能夠流傳，周亮工的推掖功不可沒。

談遷（1593-1656）為了撰寫明史《國權》，一直想要到北京收集資料，但這個願望因其窮困而很難實現，他說：「余結髮期一當於燕，既棄繻，無戶外之履，竊自恨少壯時愧司馬子長。」³³ 直到順治十年（1653），同鄉朱之錫進京供職，他才托身於朱之錫的幕府得遂此願。到了北京以後，談遷奔走豪紳之門，向當時在京任職的故明舊僚借書、訪問。他曾寫信給曹溶，說：「蒙諭史例，矜其愚瞽，許為搜示。……遷本寒素，不支伏臘，購書則奪于饘粥，貸書則輕于韋布。……幸大君子曲閔其志，託在後乘，假以程

28 清·周亮工，《賴古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附錄，頁895。

29 清·彭士望，〈與黃復仲書〉，《恥躬堂文鈔》，卷3，《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2冊，頁57。

30 清·魏禧，〈賴古堂集序〉，《魏叔子文集》，卷8，《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冊，頁588。

31 清·周亮工，《賴古堂集》，附錄，頁1008。

32 清·吳嘉紀，〈訪周櫟園先生兼呈汪恥人〉，《吳嘉紀詩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卷15，頁452。

33 清·談遷，〈北游錄紀程序〉，《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頁1。

限，廣賜攜閱。」³⁴《國權》最終的成功，和眾人的相助應該說是分不開的。

遺民有時也會主動向仕清官員提出一些要求，歸莊（1613-1673）平生以「山林野夫不宜通姓名於長安中人」自律，但爲了刊刻曾祖歸有光的文集，他只好向徐元文求募曰：「蒙高誼，得助成盛舉，豈弟一人之私感大惠，天下士林亦誦義無窮矣。倘得吹噓，廣之同調，尤幸！」³⁵要成就這類事業，若無相當資金與一定社會關係之幫助，以遺民的清寒與孤峻，很難獨立完成。

還有遺民爲個人的生計乞援。方以智的族叔，詩人方文就常常接受清廷官員饋贈，《蠡山集》中多有記錄。³⁶這些人中有昔日故交，如宋琬。方文詩云：「身如落葉飄何定，命似危途動即窮。幸有故人分厚祿，羞將短髮對春風」，「只恐君行後，無人知我饑」，³⁷受惠之深可見。也有些本不相識的官員，因爲仰慕方文的詩名而慷慨解囊。如高淳縣令崔正誼，方文云其相見後「握手殷殷道十五年相慕之意，明年爲予治裝甚厚」。³⁸

方文甚至沒有諱言自己主動上門求助的經歷。他有〈四令君詩〉，專爲感謝曾對自己施以援手的四位清廷地方官而作，³⁹方文對此似甚爲坦然。在其眼中，雙方交往的基礎是情誼的投契，〈夢崔正誼、李漑林二明府見訪談笑竟夜，醒而有作〉一詩中寫歡會之融洽：「知君念我意，與我思君同。三月楊柳花，飄飛各西東。何時重會合，轉似夢魂中。」⁴⁰如此，接受饋贈並

34 清·談遷，〈上太僕曹秋壑書〉，《北游錄》，頁266。

35 清·歸莊，〈與徐原一公肅〉，《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卷5，頁346-347。

36 謝正光，〈讀方文《蠡山集》〉一文考論甚詳，並以「旅食」稱之，見氏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109-181。

37 方文，〈祀竈日宿宋玉叔官舍有感〉、〈雨夜宿宋玉叔署齋分韻明日將之宛陵〉，《蠡山集》，頁366、245。

38 方文，〈四令君詩〉序云：「乙酉之變，予避兵吳江一載，衣食垂盡，不得已，索負於常州判某，某不為禮，困益甚。適新令張環生來，有稱予姓名者，君欣然要入其署厚餉之。未幾，宵小進蜚語，予辭去，而君意尚欲然也。戊子冬，病因白下，計無所出，友人邢孟貞言其邑令崔正誼數問予，盍往謁之。不得已附孟貞舟至高淳。」《蠡山集》，頁61。

39 方文，〈四令君詩〉，《蠡山集》，頁61。

40 方文，《蠡山集》，卷2，頁85-86。

非乞憐於人，而被看作朋友間的互相支持，不至於引起自尊的失落。

顧炎武在明遺民群體中歷來以道德峻嚴著稱，但很少有人注意到，他曾致書清吏部郎中顏光敏，託其在仕途上關照謝重輝，〈與顏修來手劄〉云：「茲有德州方山（謝重輝別字方山）謝年兄入都，附此申候。方山為內院清義公之冢嗣，翩翩文雅，更能熟於古今，少年中鮮其儔匹。屬以蔭職赴部，一切仰祈照拂。緣弟夏秋主於其家，昕夕對譚，心所歸依惟在門下。至於居官涉世之道，亦望時時提命。貴鄉才俊，可為後勁，不俟弟言之畢也。」⁴¹ 這些話，真讓人很難和持身嚴謹端方的顧炎武聯想到一起。考察起來，顧炎武曾寓居謝家為客，此信很可能是受主家之託，為其子弟請求照拂。這本為人情世故中常見之現象，顧炎武不過是從俗而行。但要嚴格推究，則不符合一般人對守節遺民的期待。不過，人的一切行為、思想、觀念以至情感，並不能都被還原為政治立場。不遵循人情往來的常規，恐怕很難進行正常的人際交往。在具體生活中，遺民們不得不使用更為靈活的標準。

以上主要就仕清者對明遺民幫助來說，二者之間的關係自然還有別的類型，例如學術交流。顧炎武著名的「古之所謂理學，經學也」之論，就是在給施閏章的信中提出的。⁴² 康熙九年（1670），他在德州講《易》，聽眾中，程先貞是明代降清的工部員外郎，李濤是康熙朝翰林院編修。⁴³ 他在北京時，又曾在另一位著名的「貳臣」孫承澤家「詳定所藏古碑刻」。⁴⁴ 魏禧是遺民中嚴謹持身者，自詡「予病廢三十餘年，不敢懷一刺一啓，事干貴人」，但由於「最愛吳門汪戶部（汪楫，清贛榆縣教諭）、宣城施愚山先生之文（施閏章）」，「欲有所商確」，⁴⁵ 而與兩人多有書信往復。學術文章既為天下公器，其是非通常並不會因政治立場的不同而發生轉移。共同的興趣將他們吸引到一起進行交流時，學理的探討往往使其暫時忘卻了出處的不同。

遺民也會接受一些仕清者的委託而從事某項文化事業，最常見的如撰修

41 顧炎武，〈佚文輯補〉，《顧亭林詩文集》，頁230。

42 顧炎武，〈與施愚山〉，《顧亭林詩文集》，頁59。

43 見王蘧常注，《顧亭林詩集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卷5〈德州講易畢奉東諸君〉之「戴注」部分，頁1014-1015。

44 關於顧炎武與孫承澤的交往，謝正光，〈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論〉有詳細考論，見《漢學研究》17.2(1999.12): 39-43。

45 引文均見清·魏禧，〈愚山堂詩文合敘〉，《魏叔子文集》，卷8，頁596。

地方志。康熙五年（1648），錢澄之（1612-1693）曾接受福建建寧府推官姚文燮的邀請主持《建寧府志》的編纂。⁴⁶康熙十二年（1673），顧炎武曾參與《山東通志》之局。這種活動既能滿足遺民表彰義烈高節、保存故國遺事的願望，又可以彌補他們私人著述時藏書不足的缺憾。顧炎武〈答葉崑初〉云：「昨見續志簡明可觀，足徵政事文章大概。……此時不過借關防為著書之便而已。」⁴⁷〈與顏修來手劄〉又說：「修志之局，群邑之書頗備，弟得藉以自成其《山東肇域記》。」⁴⁸

三、明遺民對仕清者的道德評判

明遺民對仕清漢官的拒斥，尤其是對「貳臣」的鄙薄，易代之際往往為人所樂道，各種野史筆記裏有不少記載。其中針對錢謙益（1582-1664）的最多，陳名夏（1601-1654）、龔鼎孳等曾為明臣，又在清廷宦途顯貴者也是眾矢之的。

不到一年的仕清，給錢謙益帶來一生無法洗淨的屈辱。清初野史筆記中多見譏刺他的軼事傳聞，其中不乏誇張醜化，如侯方域所見〈練貞吉日記〉中所記之事：

有先朝鉅公……嘗遊虎丘，其為衣去其領而闊袖，一士前揖，問何也？鉅公曰：「去領，今朝法服；闊袖者，吾習於先朝久，聊以為便耳。」士謬為改容曰：「公真可謂兩朝領袖矣！」⁴⁹

陳名夏是明崇禎十六年探花，官翰林院修撰，順治二年降清。遺民方文的詩集《龕山集》附錄云：

陳溧陽（陳名夏）以假歸，乞龕山（方文號龕山）定其詩，執禮甚恭。龕山反復讀之，曰：「甚善，但須改三字，即必傳無疑耳。」陳以為隱也，曰：

46 《田間文集》中，有〈建寧修志與姚經三司李書〉（《田間文集》，卷5，頁74），其詩亦云：「最重修府乘，謬以史才推……深感知己誼，詎敢老鈍辭。」（〈姚仲子經三司理初度書懷為壽〉，《田間詩集》，卷14，頁299。）

47 《顧亭林詩文集》，頁205。

48 《顧亭林詩文集》，頁230。

49 清·侯方域，〈書練貞吉日記後〉，《侯方域集校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頁459。

「寧止是？顧三字者，何也？」龔山厲聲曰：「但須改陳名夏三字。」時坐客滿舉，錯謬不能出聲。

這些記載並不十分可靠。「兩朝領袖」故事在清初流傳甚廣，卻經不起仔細推敲：錢謙益早已在數度沉浮的仕宦生涯中練就了成熟的政治素質，何至狂悖昏庸如此？新舊朝的差異原本是他心頭的隱痛，滿漢服飾也是當時的敏感問題，避之惟恐不及，他絕不可能公然以此招搖。再看方文斥責陳名夏之事，記載者朱書明言是得之傳聞，⁵⁰而且就《龔山集》裏對同樣以明臣仕清的龔鼎孳表現出的寬容和體諒來看，方文對士人出處問題的態度遠沒有這樣憤激。這些佚事恐怕是人們諷刺降臣、表彰忠烈的產物，用以一泄鬱憤之氣固然痛快，但其間不無杜撰之處。

只有深入明遺民的文集，才能了解其對「貳臣」的真實態度。真實的生活要複雜得多，各種情緒，憤怒、惋惜、體諒……往往攙雜在一起，遠沒有佚事的鮮明，然而更加耐人尋味。

斥責只是其中的一個方面。在國家破亡的創痛中，人們會把憤怒轉移於肩負社稷之責，國難來臨時卻屈膝投敵的「貳臣」，遺民們確實有這樣的情緒。歸莊〈擊筑餘音〉云：「恨只恨這些左班官平日裏受皇恩，沾封誥，烏紗罩帽，金帶橫腰，今日裏一個個稽首賊庭懷揣著幾篇兒勸進表。更有那叫做識字的文人，還草幾句兒登極詔。」⁵¹這是遺民嘲諷貳臣的最辛辣也最激烈的文字，它借著散曲的便利，以「怒罵」的形式出現，與其說是一種批評，毋寧說是憤怒的傾泄。

實際上，曾經效力明廷的「貳臣」雖然仕清，但對故國的眷念緬懷之情還是埋藏在許多人心靈深處。龔鼎孳的《定山堂詩集》中就有不少篇章流露出來，例如：「吐舌談前事，攢眉向上游。翠蛾珠珥亂，龍種玉魂秋。夜火傳深殿，銅駝立古丘。杜鵑花下血，點點是春愁。」⁵²陳名夏在給方以智的詩中說：「天末傳書雨雪深，淚痕重下短衣襟。首山仍是箕山節，東海終憐

50 朱書將此事置於其所作〈方龔山先生傳〉之外，並曰：「吾聞之吳人汪撰。」見《龔山集》，附錄，頁1188。

51 〈擊筑餘音〉，《歸莊集》，卷2，頁164。

52 清·龔鼎孳，〈述聞〉其三，《定山堂詩集》，卷5，《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7冊，頁98。

北海心。稚子遠行探虎穴，孤僧不死有人琴。當年太姥輕揮手，讓爾流離蚤入林。」⁵³以義不帝秦的魯仲連「東海」喻方以智，以漢桓帝時避仇逃難於「北海」孫嵩的趙岐自喻。趙岐後來因孫嵩的舉薦而入官，陳名夏也希望方以智能體諒自己在南都受馬、阮陷害，最終不得已的受薦仕清。

明遺民對他們的這種情緒多少能有一些理解，方以智的弟弟方其義對陳名夏說：「公激於權奸，不得已而失身，方為公惜，吾尚何欲哉？」⁵⁴體諒到「不得已」而為之「惜」，就「遺民」來說，超出了簡單的道德指斥，能夠根據士人個體的處境來對其行為加以寬容；就「貳臣」來說，這種體諒已是莫大的安慰。方文更直接把龔鼎孳視為心意相通之人，〈偕姚仙期、王尊素、紀伯紫、趙友沂、鄧孝威、吳園次、劉玉少、龔半千、李秀升集龔孝升寓齋為別限韻〉云：「四海無家何處歸，輕裝亦逐片帆飛。月明江上空懷古，雪滿人間未授衣。戎馬再來芳草歇，河橋一別素心違。蔣山西望夕陽沒，松柏凋零麋鹿稀。」⁵⁵座中大半為遺民，而詩中所謂「蔣山西望」，是非常明確的故國之思，方文在龔鼎孳齋中的聚會發如此之言，顯然並沒有把其作為背叛故國的另類來看待。

「貳臣」的仕清，原不可一概以貪圖富貴視之。不甘自廢，希望在新朝有所作為應該也是一個原因。周亮工仕清後多年在福建為官，從按察使做到了左布政使。據黃虞稷〈行狀〉，他在閩期間，守城時「晝則披甲持戟以戰，夜則獨坐譙樓中，磨盾賦詩」；治民則「贖良家子女千餘人，招使完聚，捐貲瘞城外遺骸十餘萬」，「悉民疾苦，思有以蘇息之」；為官則「表率群吏，一尚寬慈，凡一切羨餘陋習，悉禁不入」。⁵⁶《閩海紀略》記順治九年鄭成功圍攻漳州，「圍解後，署漳守道周亮工收枯骨七十三萬餘，焚瘞一大穴，豎碑曰『同歸所』」。⁵⁷《閩海紀略》的寫作立場在南明一方，對鄭氏

53 清·陳名夏，〈傳密之太史書兼讀其寄我詩次韻〉，《石雲居詩集》，卷2，《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1冊，頁673。

54 錢澄之，〈前處士方公次公直之墓表〉，《田間文集》，卷24，頁468。

55 方文，〈偕姚仙期王尊素紀伯紫、趙友沂、鄧孝威、吳園次、劉玉少、龔半千、李秀升集龔孝升寓齋為別限韻〉，《龕山集》，頁353。

56 黃虞稷，〈行狀〉，周亮工，《賴古堂集》，附錄，頁954、956。

57 清·夏琳，《閩海紀略》（《臺灣文獻叢刊》本，臺北：臺灣銀行，1958），壬辰、永曆六年，頁7。

三世稱「國姓」、「世藩」而不名。又：周亮工《賴古堂集》中有詩〈寇退出西禪寺見耦耕者〉云：「登然真足喜，況復耦而耕。園柳能爲態，畦苗亦已生。天心終厭亂，時事莫增兵。新雨連朝足，悠然水一泓。」⁵⁸幾相參照，林佶〈名宦戶部侍郎周公亮工傳〉稱其「從草昧荊棘中，以扶士氣、拯民瘼爲己任，故功德之在人者深」，⁵⁹不是虛語。

姜宸英在爲周亮工所作的墓碣銘中把他與「辭富貴而就貧賤，寧獨善其身，以置生民之休戚、理亂於不顧，至於老死而不悔者」⁶⁰相比，稱許他欲拯生民於喪亂的作爲。身爲遺民的呂留良（1629-1683）也有同樣的看法。呂留良在〈櫟園焚餘序〉中說：「豪士壯年抱奇抗俗，其氣方極盛，視天下事無不可爲。千里始驟，不受勒於跬步，隱忍遷就，思有所建立，比之腐儒鈍漢以布紵終殮村牖，固夷然不屑也。」⁶¹他對於周亮工「視天下事無不可爲」，「隱忍遷就，思有所建立」的評價，明顯高於「腐儒鈍漢以布紵終殮村牖」者。參看呂留良日後的「抱病村居，四方交遊羔雁造門者，皆支扉拒之。官於浙者……雖以勢強逼之，不可得而屈辱」⁶²的行爲，會使人以爲矛盾，感到疑惑。呂留良在發出如此議論的時候，顯然沒有把忠於故國的節操持守作爲士人自我實現的唯一途徑；施展才幹，有所建樹，在他看來也是價值實現之途。他所鄙薄的，是「腐儒鈍漢」的無用，他自己隱居中的最大心願，是「完一兩本有用之書」，可知有益於世仍是其人生價值觀的重要內容。正是這一點使遺民暫時取消了「故國」與「新朝」的對立，對「貳臣」的仕清並不一味排斥。

錢謙益的情況更爲複雜，作爲東林黨魁，他的失節爲人矚目，而他歸里後一直堅持抗清的事實，也是遺民在評價他的生平大節時不能不考慮的另一個重要因素。錢澄之說他：「半生出處滋多議，一代文章定許傳。」⁶³「滋多議」點出了錢謙益生前身後人們對他評判的分歧。明遺民中的確有人對他

58 《賴古堂集》，卷5，頁252。

59 清·錢儀吉編，《碑傳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卷10，頁552。

60 《賴古堂集》，附錄，頁945。

61 清·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卷5，《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148冊，頁563。

62 呂葆中，〈行略〉，《呂晚村先生文集》，附錄，頁624。

63 〈書有學集後〉，《田間文集》，卷20，頁398。

加以責難，⁶⁴但更多人沒有僅僅以其降清來概括他的「晚節」。朱鶴齡云：「虞山公生平梗概，千秋自有定評，愚何敢置喙？」⁶⁵「千秋自有定評」即目前不可定論，目前不可定論當然不是隱晦錢謙益的失節，那麼不可說的，目前還不方便說的，自然是他抗清之事了。朱鶴齡此言，相當於把他失節之後的補過也納入了對其節操的評判。歸莊說得更明白一些：「窺先生之意，亦悔中道之委蛇，思欲以晚蓋，何天待先生之酷，竟使之賚志以終。」⁶⁶完全原諒了錢謙益的，是方文，他和錢謙益的〈紅豆詩〉云：「荊棘銅駝絕可憐，江村孺樹尚依然。從今逆數花開日，正是崇禎十七年。」⁶⁷這已經不是普通的故國之思了，他是在直接追數故國逝去的年歲，而且是在為錢謙益賀壽之際，⁶⁸很難想像一個遺民會跟一個「貳臣」在情感上如此貼近，理由只有一個，方文對錢謙益的故國情懷是完全認同的。他當然不可能完全忘卻錢謙益的失節，那麼，在他看來，錢謙益的補過之舉已經能夠抵消他的過失。

易代之際，像錢謙益一樣沒有經受住生死考驗，後來又斂跡自晦的降臣不止一個，與遺民交往比較多的還有史可程。史可程是史可法的同祖弟，明崇禎十六年（1643）進士，選庶吉士。史可程在崇禎十七年曾經歸降李自成，此事錢邦芑《甲申忠佞紀事》、文秉《烈皇小識》、計六奇《明季北略》、溫睿臨《南疆逸史》等書均記錄在案。王蘧常《顧亭林詩集彙注》並引張穆《亭林年譜》云：「睿親王致可法書所云『及入關破賊，識介弟於清班』者，謂可程也。」⁶⁹如果此言不虛，那麼史可程就是一個既降李、又降清之人，此類人在清初最為人所不齒。但史可程不但與顧炎武交厚，而且與方文等遺民有交誼。⁷⁰顧炎武稱為：「赤豹（史可程字赤豹），君子也，久居江

64 時人對錢謙益之評判，可參見謝正光，〈探論清初詩文對錢牧齋評價之轉變〉一文，見《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60-108。

65 清·朱鶴齡，《愚庵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卷10，頁483。

66 〈祭錢牧齋先生文〉，《歸莊集》，卷8，頁471。

67 方文，〈紅豆詩〉，《蘆山集》，頁1140。

68 該詩序文云：「虞山之東三十里有芙蓉莊，乃牧齋先生讀書處也。莊前紅豆樹一株，高數丈圍數尺，枝葉蒼翠不花者二十年矣。辛丑三月（順治十八年）忽開花，是年九月為先生八十初度，枝頭又結一子，似特為先生壽者，先生暨諸同志各為詩以張之，踰年癸卯，予至虞山，聞其事亦補八首。」同上註，頁1139。

69 《顧亭林詩集彙注》，卷4〈酬史庶常可程〉，頁831。

70 方文，〈送史赤豹游姑孰〉云：「君是先朝侍從臣，竭來江左作閒人，……中宵且莫論心

東。」⁷¹並贈詩給他，說：

伊尹適有夏，太公之朝歌。吾儕亦此時，將若蒼生何？跨驢入長安，七貴相經過。不敢飾車馬，資用防其多。豈無取諸人，量足如飲河。顧視世間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譏訶。君今寓高都，連山阻巍峨。佳詩遠寄將，建安激餘波。想見蕭寺中，抱膝苦吟哦。古人尚酬言，亦期相切磋。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願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⁷²

詩中有三處值得注意：（一）顧炎武對史可程說「吾儕亦此時，將若蒼生何？」分明是對他有高的期許，可見並不因其曾經降李降清而鄙夷之；（二）「顧視世間人，夷清而惠和。丈夫各有志，不用相譏訶」，未解何意，謝正光〈顧炎武與清初兩降臣交遊考〉說是為史可程的失節而開脫，⁷³字面上來看似乎不錯，但聯繫顧炎武對降清者的一貫態度，即使原有，不致云「各有志」，姑且存疑。（三）顧炎武對史可程很關心，勸他「無受惠」、「無倦游」，二人之間不是普通的交往，而是互有德行砥礪。史可程答詩題為：〈寧人盟長答余詩云：願君無受惠，受惠難負荷；願君無倦游，倦游意蹉跎。物老則息，游何可長耶？受惠難負荷，君子哉言乎！載賡一章寄謝寧人，知不我遐棄也〉，詩中說：「幸有同心侶，隱然無苟甜。展卷未及終，汗浹敝衣沾。」⁷⁴可見兩人是頗為知心的。顧炎武以一個節操卓立之遺民與史可程這樣的降臣交往，史可程感激為「不我遐棄」，王蘧常則解釋為「亦與其潔不保其往之意。」⁷⁵史可程在降清一事上和錢謙益並無二致，他還降順了直接傾覆明朝的李自成，就遺民的情感來說，更難接受。但幸運的是，他國變前沒有錢謙益的聲望，也就沒有像錢謙益那樣被置於最顯眼處接受眾人的圍攻，以顧炎武持身的嚴謹、性格的倔強，能著眼於他後來的生活方式給予肯定，也許可以代表自身道德立場非常堅定的遺民對這一類人的寬容與諒解。

事，回首燕臺淚滿巾。」《盦山集》，頁390。

71 顧炎武，〈與人書六〉，《顧亭林詩文集》，頁92。

72 〈酬史庶常可程〉，《顧亭林詩集彙注》，卷4，頁832。

73 謝正光，《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319。

74 〈同志贈言〉，《顧亭林詩集彙注》，附錄，頁834。

75 《顧亭林詩集彙注》，卷4〈酬史庶常可程〉，頁831。

在明朝沒有仕宦經歷的士人在新朝參加科舉入仕，輿論的壓力要小得多。不少人認為，他們在「養親」與「忠君」之間，可以傾向於前者。遺民毛先舒云：「士君子邁鼎革之際，出處大要斟酌。若於先朝未嘗仕者，新朝自不妨出，然又當以親斷之。若向嘗仕，而親欲我之貳心者，從命，即非人臣。向未嘗仕，而親期我之祿養者，違命，即非人子。論定於已仕未仕而權衡君親之間，士君子之出處可決。」⁷⁶

隨著亡國日久，明遺民不得不面對後輩對新朝功名的追求。陳確（1604-1677）說：「甲申之後，吾友之出試者絕少，而子弟則稍稍出試。」爲此，他專門作了一篇〈使子弟出試議〉，文中批駁了「子弟不試，必廢學」，「賢者才高而欲出」的流俗之見，認為那是「以子弟之出，成吾之不出」，不是真正的替後輩著想。至於應否出試的關鍵，還在於「吾惟吾正義之斷」，⁷⁷即講究動機的純正。如果不得已而試，那麼「試故不可苟也。文，吾盡心焉，售不售則命也，無喜戚焉可也。」⁷⁸他的意思，歸結到一點，就是不可把出試作爲謀求利祿的手段，而應當在其中貫注道德追求，無論是養親，還是由此施展才幹以圖匡濟，都可以作爲出試的正當理由。反之，只要存了貪慕富貴之意，即使自己不出試而把它轉移到後輩身上，同樣於道德有損。

由此可見，遺民雖然出於個人對道德完善的追求和對故國的情感自己堅決拒絕出仕，但對其他人的具體處境和行爲還是能夠理解和接受的。遺民與一般人的最大不同在於，他們爲出仕於新朝提出了一個道德前提。這時仕與不仕已經退居次要地位，更重要的在於個體的「居心」。陳確友人孫宏因「家貧母老，強顏一出」而受世人非議，陳確非常不滿，說：「吾悲世士之論，不知本末，而徒相切切然以幼安（孫宏字幼安）之出爲恥……嗟乎！此夫不自知其可恥，而漫焉以恥人之不必恥。」他力言孫宏的道德品質無可訾議，「幼安之天性孝友，孜孜好學，有過人者。其抑心下志，忠事儕輩，切切惓惓，獎率羣材，如將不及焉。幼安文章氣誼，吾黨莫之或逮，而畏義隱約，終始一貫。」並由此認爲：「其不變節于當官，可知也」，「幼安雖

76 《皇明遺民傳》，卷4〈毛先舒〉，《明遺民錄彙輯》，頁43-44。

77 以上引文均見《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頁172。

78 清·陳確，〈試訟說〉，《陳確集》，頁251。

出，而其所不出者固在也」。⁷⁹ 他提出，出仕並不等於「變節」，恥與不恥不能決定於行跡，它的根本是行爲個體的道德水準，其判定也必須就產生行爲的具體原因與動機來作出。此言與孫奇逢所言「不違道而干進，志何降而身何辱焉」⁸⁰ 如出一轍。這雖然是遺民因體諒友人的處境而爲之進行的辯護，但客觀上也爲出仕者找到了減輕愧疚的辦法，爲他們適應新的環境，同時又安頓好道德需求提供了出路。

遺民也會對進入仕途的親友提出道德要求。魏禧在〈送新城黃生會試序〉中念念於生民之苦：「出者以好士愛民爲大。今天下民困豐荒，稻狼藉於困籬，而飢寒於室；四海安恬，而貧者無以生，富者日懼其死；閭閻側目重足，凜然有不終日之憂。」⁸¹ 並循循勸勉追求功名的黃生勵志、勤學、愛民、廉謹。顧炎武告誡外甥徐元文：「所謂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吾甥宜三復斯言，不貽譏於後世，則衰朽與有榮施矣……誠欲正朝廷以正百官，當以擊濁揚清爲第一義，而其本在於養廉。」⁸² 這些暫時拋開了新朝與故國的對立立場的要求和鼓勵，都基於同一出發點：在不得已的情況下，可以用更廣泛的道德修養的講求來代替對易代之際士人道德的特殊要求——即使不守遺民之「義」，儒家道德中的仁義傳統也不可就此丟棄。

陳確甚至說：「出處一理，而士或相非，不其陋與！余夙以衰病謝事，不復理經生家言。二子皆蠢笨，不解文字，遂父子力耕泥橋之畔。而世之觀聽聲影者，謂陳子隱者耳，不當復與言用世事。此非知陳子者。間作〈出處論〉以一之，而士或未之察也。嗟乎！『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當吾世而有以斯世斯民爲己事者，吾拜而禱之，況當有異同之見乎哉！」⁸³ 他認爲自己父子的歸隱，並不是放棄了對世事的關懷，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守的唯一準則；具有普遍意義的，是「斯世斯民」，也就是儒者對天下生民的責任。像方文云「道在何妨仕」，錢澄之云「吾道未妨蹤跡異」，⁸⁴ 「跡判行藏

79 陳確，〈哭孫幼安文〉，《陳確集》，頁 320。

80 清·孫奇逢，〈藍田知縣乾興楊君墓誌銘〉，《夏峰先生集》，卷 9，《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 118 冊，頁 249。

81 魏禧，〈送新城黃生會試序〉，《魏叔子文集》，卷 10，頁 632。

82 顧炎武，〈又與公鼎甥書〉，《顧亭林詩文集》，頁 55。

83 陳確，〈送謝浮弟北上序〉，《陳確集》，頁 242。

84 錢澄之，〈吳茂孫謁選都門晤間有懷王而農〉，《田間詩集》，卷 19，頁 416。

道不殊」，⁸⁵都是同一個意思。

明遺民對他人出試的態度緩和甚至開放，主要源於他們必須適應朝代更替的事實和新的環境。當新朝的統治逐漸穩定了之後，大多數士人會開始考慮安排自己的實際生活。以施閏章為例，他幼年喪父，由叔父撫養成人，在〈先叔父文學公砥園府君行狀〉中他回憶說：「比閏章成進士，公喜且泣曰：『惜汝父不及見也。』」⁸⁶老人對後輩上進的期望，沒什麼改變，生活因易代而發生了一些動盪，但很快又回到它原來的軌道。儘管顧炎武常告人曰：「生子不能讀書，寧為商賈、百工、技藝食力之流，而不可求仕。」可是他的三個外甥，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1658）狀元，徐乾學是康熙九年（1670）榜眼，徐秉義也是康熙十二年（1673）一甲第三名，顧炎武不但無力干涉他們的仕進，還不能因此而割斷了和他們的親緣關係，此時唯一能做的，也就是加以引導了。

值得注意的是，由於交往中的相互理解帶來欣賞，遺民並不吝惜對仕清者的讚美之辭。如施閏章，其道德人品在遺民群體中備受推崇，沈壽民贊曰：「子翔、治先之歸也，抵掌稱東人士沐浴教澤甚備，延及南國，悉載仁施……微愚山，今竟不古若矣。」⁸⁷顧炎武贊曰：「素心高誼，不可於今日宦途中求之矣。」⁸⁸魏禧贊曰：「廉仁之聲暢于鄰郡，又聞躬自講學，會者千人，禮樂雍容，為近世所未嘗有。易堂諸子心竊嚮往而短垣不可踰越，歎息企踵，望風慨然。」⁸⁹方文贊曰：「吁嗟古道今已稀，使君高義何巍巍。佇看廣廈勢突兀，大庇天下寒士皆春暉。」⁹⁰呂留良贊曰：「先生膺斯世斯文之望，所居與遊，論文講義，流傳遠近，在陶鑄中者不為少矣。」⁹¹這些讚美，不但涉及他對遺民的關照與情分，更出自對其品格的認可甚至敬仰。

最容易為遺民感受到的是仕清官員治理地方的德政。康熙二十九年

85 錢澄之，〈訪王敬哉宗伯〉，《田間詩集》，卷18，頁389。

86 清·施閏章，《學餘堂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商務印書館，1983），卷17，頁218。

87 沈壽民，〈與施愚山〉，《姑山遺集》，卷24，頁278。

88 顧炎武，〈與施愚山書〉，《顧亭林詩文集》，頁58。

89 魏禧，〈答施愚山侍讀書〉，《魏叔子文集》，卷6，頁494。

90 方文，〈施愚山少參加惠乳山林翁不一而足詩以紀之〉，《衿山集》，頁951。

91 呂留良，〈與施愚山書〉，《呂晚村先生文集》，卷1，頁488。

(1691)，浙江餘姚大水，「平地水丈餘，屋廬飄沒，人民溺者無算，棺槨皆湧地而出，禾稼一空」，⁹²當時的浙江布政使是馬如龍，《清史稿》卷275本傳云其：「檄十一郡合輸米二萬餘石，按戶賑給。」⁹³爲此，黃宗羲專作一篇〈大方伯馬公救災頌〉讚頌其事，曰：「萬民歡呼雷動，起於白骨，即未受災之年，亦未能如此之一飽也。」⁹⁴

魏禧文集中多可見其對戰亂後黎民困苦的關切，嘗云：

自吾贛至揚州三千里，所見所傳聞三四年間，天下民生之苦，未有甚于江西者。寇兵所蹂躪，其夫妻子母死亡離散不相保聚者十之五六。無衣食飢寒死、垂死者十七八矣。江南號稱樂土，然民困賦役，不啻十室而五，而揚之下縣，七年被水災，民死亡殆盡。⁹⁵

基於同樣心情，他讚頌過寧都的多位地方官，〈周左軍壽敘〉贊其靖民定亂之功：「左軍周公蒞贛之二年，爲甲寅乙卯，西南變起，贛屬盜暴發，吾寧尤甚。公以世胄負文武才，數奉檄出師，馬足所至，刻日報平，余家金精斗絕之山，然宗廟田廬婚友之散在城野者，皆仰庇公功。」⁹⁶〈贈萬令君罷官序〉贊其廉正愛民之德：「武進萬君以明經令吾寧都，始至優緩，循默若迂儒之無所爲者，已而寧之民見其廉也，曰三十餘年無是官矣。已而見其才，曰五六十年無是官矣。已而見其所守，久而益介，大兵大亂，處之若無事也，曰吾儕耳目所及覩記，無是官矣。」⁹⁷又贊學道丁雁冰倡文新民之化：「比年閩粵既靖，吾贛稍稍休息，徵役之困，尙未知所息肩。百室空虛而民愁苦，猶且絃誦咏歌者，比戶而不絕。以公之寬仁，振之以學道之化，拊循而涵濡之，所謂小人易使者，亦庶幾其可見。」⁹⁸

孫奇逢云：「世有今古中外，道無今古中外」，⁹⁹遺民固然自認爲是儒家之道的守護者，但「道」並非爲某人或某個群體所有，而是天下之公器，凡

92 黃宗羲，〈大方伯馬公救災頌〉，《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144。

93 趙爾巽等，《清史稿》，卷275，頁10065。

94 黃宗羲，〈大方伯馬公救災頌〉，《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145。

95 魏禧，〈贈黃書思北游序〉，《魏叔子文集》，卷10，頁651。

96 魏禧，〈周左軍壽敘〉，《魏叔子文集》，卷11，頁688。

97 魏禧，〈贈萬令君罷官序〉，《魏叔子文集》，卷10，頁653。

98 魏禧，〈問山詩集敘〉，《魏叔子文集》，卷9，頁623。

99 孫奇逢，〈報白仲調〉，《夏峰先生集》，卷7，頁189。

有志者皆可以不同程度地獲得對它的理解，並使之得以顯現。行政的有益民生即為其顯現方式之一，它不因實施者的政治立場而發生改變。「存道」與「益世」雖然在特殊時刻不能相容，卻不妨相互的理解。故孫奇逢在為清河南布政使梁如星撰寫的墓誌銘中說：「公余六十年老友也，出處離合，局各不同，而吾兩人相視則無不同也。」¹⁰⁰有益民生是來自儒家仁道的絕對原則，不因朝代的更迭而變化。儘管清人可能更看重統治的穩固，未必以此為終極目標，但仕清者如果對道還持有信仰，便會遵循這一原則。這就是孫奇逢認為自己與梁如星「無不同」的基礎。

四、仕清官員同化遺民的努力

由於仕清者處於清廷與明遺民之間的位置，和他們的交往會對遺民的政治立場產生一些影響。陳名夏的老師芮城國亡以後便割斷了師生情誼，《清先正事略》云：「名夏以大學士歸鄉，求一見，卒不可得。貽書候問，亦不發視，曰：『山澤之臞，一與貴人接，便喪所守矣。』」¹⁰¹「便喪所守」固然是為保護個人節操純粹所發的激烈之言，卻也不完全是空穴來風。仕清官員確實有試圖同化遺民的傾向，陳名夏就曾向清廷舉薦過多位遺民，如沈壽民、周歧、嚴書開、¹⁰²徐世溥，¹⁰³都遭到了拒絕，周歧〈嫠女吟答陳百史〉委婉微諷：

有客何方來，將書委筐箱。開緘讀素書，姊妹舊成行。上慰顏色好，下言夫婿當。疊書筐箱中，卻拜歸空房。孤鸞戀枯澤，彼鳳自有凰。感君纏綿意，還君明月鐙。寄謝諸姊妹，勉事新姑嫜。¹⁰⁴

沈壽民則十分決絕：

龔勝、謝枋得，智非不若皋羽、所南也；而卒殞軀者，由多此物色耳。今之

100 孫奇逢，〈河南左布政如星梁公墓誌銘〉，《夏峰先生集》，卷9，頁234。

101 清·李元度纂，《清朝先正事略》（臺北：明文書局，1985），卷47，頁594。

102 清·徐承禮，《小腆紀傳補遺》，卷5，收在清·徐鼎，《小腆紀傳》（《臺灣文獻叢刊》第138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頁1019。

103 《小腆紀傳補遺》，卷4〈文苑傳〉，頁1000。

104 錢仲聯，《清詩紀事·明遺民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87），頁980。

薦僕者，直欲死僕耳。¹⁰⁵

即使像閻爾梅這樣因復明活動為清廷搜捕繫獄的遺民，陳名夏也曾有延聘之意，閻氏詩〈答陳百史〉一云：「絕無世上彈冠想，徒有年來卻聘書。」再云：「龔勝堅辭新室組，臧洪遲復故人書。」¹⁰⁶ 陳名夏似乎有意識地調節遺民與清廷之間的關係，他一方面幫助遺民消除因其反清、仇清而產生的災難，另一方面也實心實意地為清廷做著打算：吸納遺民仕清，不僅可以削弱反清勢力，減少異己思想的影響；新朝的穩定也非常需要這些才智之士。

陳名夏等人對遺民的薦舉，雖多遭拒絕，但並非全無成效。吳偉業（1609-1671）入清後隱居十年而出仕，就是其成效之一。吳偉業曾多次被薦，此次終於成功，有賴於眾多仕清漢官的共同努力。事前，先有嚴正矩在京師鼓吹，云：「如吾師婁東先生者，如山之有嵩、恒、衡、霍，不必論其有出雲致雨之功，然天地無此巨嶽，無以成其重。」¹⁰⁷ 然後次第由馬國柱、孫承澤、馮銓提出保薦。順治九年（1652），馬國柱以兩江總督的身分「遵旨舉地方品行著聞及才學優長者」，疏薦吳偉業；次年，孫承澤薦其：「學問淵深、器宇凝宏，東南人才無出其右，堪備顧問之選」。十一年，馮銓再薦其「才品足資啓沃」。¹⁰⁸ 此外，陳廷敬〈吳梅村先生墓表〉云：「本朝初，搜訪天下文章舊德，溧陽、海寧兩陳相國共力薦先生。」¹⁰⁹ 溧陽陳即陳名夏，他與吳偉業在國變前就有交情，在眾人的推薦熱潮中推波助瀾當為情理中事；海寧陳指陳之遴，顧公燮《消夏閑記》云：「海寧相陳之遴薦吳梅村祭酒至京，蓋將虛左以待。」¹¹⁰ 陳之遴是吳偉業的兒女親家，時任戶部尚書、內翰林弘文院大學士，亦為援引吳偉業入朝的熱衷者之一。

吳偉業仕清時間前後不到三年，卻給他帶來了巨大的精神痛苦。他本為一位海內景仰的守節遺民，侯方域稱為「十年以還，海內典刑淪沒殆盡，萬

105 黃宗羲，〈徵君沈耕岩先生墓誌銘〉，《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383。

106 閻爾梅，〈答陳百史〉，《清詩紀事·明遺民卷》，頁141。

107 嚴正矩，《涉園集》，卷21，轉引自馮其庸、葉君遠，《吳梅村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0），頁291。

108 《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79〈吳偉業傳〉，頁6552。

109 《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附錄一，頁1408。

110 顧公燮，《消夏閑記選存》（蘇州：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9），「拙政園」條，頁7。

代瞻仰，僅有學士」，¹¹¹ 出仕後卻受人譏諷，自身也陷入名節汙損的羞辱感中，以至臨終追思平生，居然以「竟不值一錢，何須說」¹¹² 絕筆。在明遺民群體隨著亡國時日漸遠而逐漸分化的過程中，仕清漢官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與他們的交往強化著遺民與世俗生活的聯繫，而與世俗生活的糾纏正是遺民們轉移政治立場最主要的原因。

五、輿論環境

遺民與仕清者的交往，往往會給他們的道德評價帶來負面影響。遺民傳統中的「不食周粟」、「不交當世」，似成為「遺民道德」的一項重要標準，社會各類人群皆以此來衡量其節操高下。明遺民亦多以此自律，這使他們對交往的態度顯得猶疑。魏禧本傾慕施閏章的道德與文章，但在與之相交時，卻先有一番自我表白：「予病廢三十餘年，不敢懷一刺一啓，事干貴人。」

他曾為此批評過方以智。當時方以智住持青原山，聲名甚盛，從學者衆多，其中僧俗宦儒雜糅。於是魏禧寄書相責其招搖：

適者道譽日盛，內懷憂讒畏譏之心，外遭士大夫群衲之推奉，於是接納不得不廣，干謁不得不與，辭受不得不寬。形跡所居，志氣漸移。夫規時以行權者，豪傑之事；全身任道，聖賢所不廢。師之出此，識者猶將諒其不得已，而今則既三年矣。禧粗覽佛書，從來古德，於道行法明之日，往往掛鞋曳杖，減影深山，後世莫不高其行，譬猶神龍雲中，偶見爪甲。故曰：安知鳳凰德，貴其來見希。若鱗鬣首尾，終日示見，則禹屋畫壁、孔廟雕柱之物耳。¹¹³

「畫壁」、「雕柱」云云，話說得非常尖刻，說這話時魏禧尙避世易堂，自認為愛人以德，很難理解對方的實際處境。而幾年以後，他出遊東南，交接漸廣，竟遭到了友人徐孝先同樣的批評。他回信解釋道：

弟閉戶十八年始出遊，交東南賢者。歸又八年，而出處取與間常兢兢恐失山中面目，而交游勢不得不雜，文字酬應不得不多，乖違本志，遂亦不少。杜

111 侯方域，〈與吳駿公書〉，《侯方域集校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卷3，頁157。

112 吳偉業，〈賀新郎〉，《吳梅村全集》，卷22，頁585。

113 魏禧，〈與木大師書〉，《魏叔子文集》，卷5，頁471。

子美云，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每念斯語，展轉生媿，始信浮沉之際，大是難爲。¹¹⁴

他終於在浮沉之際體會到出處之理看似分明，然而置之實際生活，二者之間就會生出許多模糊地帶，使人很難取捨。但此種苦衷難向人道：若就種種纖微曲折處細細分辨，則不免有許多瑣碎言語，露出寒乞之態；於是魏禧只好以「乖違本志」自責而已。

魏禧的易堂同志彭士望（1610-1683）在處理和江西饒州推官翟世琪的關係時則採取了不同策略。彭士望與邱維屏通信稱翟世琪「虛懷好學」，言其署中「天涯知己，同聚一堂」：翟必爲一樂於結交遺民者。他因歎賞彭士望之詩而表露結納之意，彭士望卻有其他考慮。儘管有好友的引見，他也能夠體會到翟的厚意深情：「翟公固未嘗見望，而望初未嘗有毫末自通于翟公，乃其屬意于望而欲亟見之者，絕不同於世俗之揚聲光求容悅之聞士，則翟公之于望，不可謂不知我矣」，卻終究要等到對方離開江西，雙方脫離管轄關係之後才肯一見：「請俟翟公陞任去饒之日，望當命棹千里，從童叟攀車之後，一識荊州，仰酬盼睽，庶亦無慚于古者士相見之禮也。」究其原因，在他對身後清名的看重；他擔心著世人的評說，爲了同那些「瞽史之擊拊，伶官之抵掌求悅主人，乞其優賚」者有所區分，他表示「寧爛死於泥中，與荒煙冷風隨時消滅」。¹¹⁵

遺民有時甚至會對這類往來有意遮掩。據謝正光考證，顧炎武與仕清的「貳臣」曹溶、孫承澤都會有非常密切的往來，¹¹⁶但《亭林詩文集》中並未留下任何文字紀錄。顧炎武在〈與人書五〉中也談過他的態度：「君子將立言以垂於後，則其與平時之接物者不同。孔子之於陽貨，蓋以大夫之禮待之，而其作《春秋》則書曰盜……此孔子所以爲聖之時也……今子欲以一日之周旋，而施諸久遠之文字，無乃不知春秋之義乎？」¹¹⁷他明確地把「一日

114 魏禧，〈與徐孝先〉，《魏叔子文集》，卷7，頁529。

115 清·彭士望，〈復邱邦士書〉，《恥躬堂文鈔》，卷2，頁40。

116 參見謝正光，〈顧炎武、曹溶論交始末——明遺民與清初大吏交遊初探〉、〈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論〉，均收入謝著，《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頁182-221；330-391。

117 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頁92。

之周旋」與「久遠之文字」區分開來，將前者作為應時之術，排除在他的價值體系之外。但如果認真追究，顧炎武給不少仕清官員的書信，實不乏深度的思想交流與真摯融洽的情感，絕非「一日之周旋」可以淡然抹殺。之所以要做此番表白，做作背後，是明遺民與時貴交往而承擔的巨大輿論壓力。

他們往往受到來自群體內部的批評。王夫之（1619-1692）曾與金堡同仕永曆朝，在政治風波中相互支持；金堡披緇之後，周旋於權貴之間，引起了王夫之強烈的不滿。在《搔首問》中，責其「以崇土木，飯髡徒之故，不擇人而屈下之」，「盡忘其本色」。¹¹⁸陳恭尹晚年為避禍計，多與時貴酬答，也招致粵東遺民岑徵諷云：「可憐一代夷齊志，卻認侯門作首陽。」¹¹⁹就遺民群體中普遍存在的這種現象，傅山有詩譏刺曰：「高尚名歸義士羞，只緣人見彼王侯。鉤除巢許嚴陵老，隱逸真堪塞九州。」¹²⁰

這也是整個社會品評遺民的共同標準。方文京師遊，因結交公卿遭受非議，時人「不知先生者，……謂先生以處士而與公卿大夫游，又入其名詩題中，以此為詬議。」¹²¹其他如杜濬、余懷、黃宗羲等人，也都因此而為人詬病。

人們對遺民的品題，也很重視這個標準。清初朱書為方文作傳記，就稱其「遊徐州，入燕北，探孤竹，諸貴人多折節交之，文顧時時狂罵曰：『齷齪，毋近牀汙我。』」¹²²檢閱方文北遊時期留下的時文，與魏裔介、宋琬、龔鼎孳、王士禛等「貴人」均情好歡洽，奉酬魏裔介詩，甚至以菟絲女蘿為喻：「女蘿本柔條，兔絲亦平蕪，得附松柏枝，千歲永不枯。」¹²³朱書的敘述，若非有意掩飾，則必定摻入了他對遺民品行的想像——這也可能是來自當時流行的遺民事蹟標準敘述方式的影響：翻開遺民傳記，孤峻仿佛已是品質高尚的最好證明。

實際上，部分遺民已對此有所警覺和應對。錢澄之曾以亂世之中的自存

118 清·王夫之，《搔首問》，《船山全書》（長沙：嶽麓書社，1996），第12冊，頁635。

119 陳伯陶，《勝朝粵東遺民錄》，卷1〈岑徵〉，《明遺民錄彙輯》，頁244。

120 清·傅山，〈口號十一首〉，《霜紅龕集》，卷13，頁339。

121 王澤弘，〈北游草序〉，《龕山集》，頁536。

122 朱書，〈方龕山先生傳〉，《龕山集》，附錄，頁1186。

123 方文，〈奉酬魏都憲石生〉，《龕山集》，頁554。

之道來論遺民應酬文字的不得已：「先生（文燈巖）負一時人望，素為君子所觀型，而為小人所側目者，世豈能忘先生？先生亦豈能忘世乎？自變亂以來，士大夫以節義致誅滅者，江右為甚。先生日在風波震撼之中，而卒以不死，則應酬文字或亦有力焉。」¹²⁴ 黃宗羲則從人生世間，便無法脫離俗緣塵網來說：「生此天地之間，不能不與之相干涉。有干涉則有往來。陶靖節不肯屈身異代，而江州之酒，始安之錢，不能拒也。」¹²⁵ 輿論壓力之下，他們不得不通過為交往尋找合理性來自我辯白。

不追求痛快鮮明的道德評判，而有意對遺民的具體環境加以體察者，也從一些細節入手來證明這種交往未必與節操汗損有必然聯繫。全祖望論黃宗羲云：「先生之所以自處，固有大不得已者。蓋先生老而有母，豈得盡廢甘旨之奉？但使大節無虧，固不能竟避世以為潔。」¹²⁶ 儘管不能放棄對「避世以為潔」的尊崇，畢竟表示了理解和寬容。王澤弘為方文辯護曰：「先生雖與諸公卿大夫游，其所贈答詩，無一媵阿之語，自負甚高，寄托甚遠，與昌黎所上宰相書等。不為公卿大夫所忌諱亦幸矣，其肯以此取悅乎？況所謂公卿大夫，皆先生向時風雨寤寐數十年不渝之交，如以其仕隱殊途，遂欲與數十年朋友之交絕，其於詩人忠厚和平之意遠矣。」¹²⁷ 儘管所謂「皆數十年不渝之交」不盡屬實，頗有回護之意，然而其以交往中的態度而非交往本身作為判斷標準，實際上已經為交往留出了空間。《明遺民詩》的編撰者卓爾堪云：「遺民惟重末路，苛求其他，吾則何敢？」¹²⁸ 卓氏生長於清初社會，交遊中不少遺民，「何敢」之言，來自其對遺民群體生活狀態的深入了解；正是這了解給了他體貼與尊重的態度。

不過，滿足人們激濁揚清的快意心理，傳統標準直至現代社會仍有強大的影響力。今人陳垣論金堡云：「今所傳《遍行堂集》二，有某太守、某總戎、某中丞壽序十餘篇，……睹其標題，已令人嘔穢。」¹²⁹ 王蘧常對「以搢

124 錢澄之，〈求是堂集序〉，《田間文集》，卷13，頁234。

125 黃宗羲，〈余若水周唯一兩先生墓誌銘〉，《黃宗羲全集》第10冊，頁284。

126 全祖望，〈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全祖望集彙校集注》，頁1696。

127 王澤弘，〈北游草序〉，《龔山集》，頁536。

128 清·卓爾堪，〈明遺民詩〉，凡例第5則，頁3。

129 陳垣，〈清初僧諍記〉，《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頁559。

拄正氣爲己任」的顧炎武，與「曾降清，以原官用，且曾腰玉爲清效奔走」的程先貞，「集中相贈詩多至數四」，「相契之深如此」，大感「不可解」。¹³⁰

這種不解是研究者受既定闡釋框架限制的結果。實際上清初社會已經存在著多元的價值標準，遺民的人際交往也面對著各種不同的需求。對某種精神理想的追求，常常使人在理解歷史時似乎忘掉了人生常態。歷史語境的恢復在歷史研究中日益受到重視，正體現了學界追求對歷史現象更豐富理解的努力。

六、結 語

總的來講，遺民對故國的忠誠指導著他們現實生活中的行爲準則，但同時，生活中的各種具體問題使其難以迴避與官員的交往。他們把生活細節與道德理想加以區分，在於「大節」無損之時，通過人際關係的變通與調整滿足生活的具體需要。遺民是一個基於政治立場而產生的身分定位，但現實生活中的人生有許多側面，會產生豐富的人際需求，它們並不完全統攝於這個政治立場。一個具體的遺民，是一個現實生活中因緣複雜的人。他交往的人群很可能背景各異：他會遇到需要他人幫助的困難，其中不乏必須得動用財富、權勢者；他會有各種各樣的生活需求，即使單說精神層面，除了政治信仰之外，也還有性情、學問等等。當這些交往、需求不至於危及他們道德理想的堅持時，他們會有意識地忽略交往對方政治立場的差異，方文說「仕隱雖分本同氣」，¹³¹ 魏禧說「華夷各君臣，中外仍朋友」，¹³² 都力圖以私人交誼來爲雙方的交往尋找合理性。

無論是明遺民接受幫助，渡過難關或解決問題後的真誠感激，還是對對方可貴品德的頌揚，亦或是由於「善政」，爲「當世民生」而欣悅的讚歎，

關於金堡的評價，廖肇亨，〈金堡之節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一文謂其「甘舍一己之令譽，而以拯饑救溺爲己任」，「強調大乘菩薩道的普度眾生的理想，致使其終日往還於權貴之門」，爲理解清初遺民不同「節義標準」提供了新的思路。文見《中國文哲研究通訊》9.4(1999.12): 113。

130 《顧亭林詩集彙注》，卷4〈酬程工部先貞〉，頁906。

131 方文，〈王望如招飲談詩即席賦此〉，《菴山集》，頁445。

132 魏禧，〈詠史和李咸齋〉，《魏叔子詩集》，卷4，《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冊，頁339。

都體現出政治立場的對立在交往中被忽略、被跨越了。它背後有如下一些基礎：（一）當遺民意識到有明一代已經過去，「改朝換代」作為事實已經發生在身邊時，除了自己獨特的個人堅持之外，他們還得承認並且適應大的歷史環境的改變。對他人的體諒使他們尊重其選擇，對世俗人生的理解甚至使他們鼓勵對方在仕途上的努力。顧炎武在給李源的信中如此祝願他的家人：「季子亦誦詩舞勺時矣，秋闈折桂，旦夕俟之。」¹³³ 方文在〈送王望如補官北上〉中對老友說：「努力驅車向京國，蘭臺芸閣不須占。」¹³⁴ 這是一個多種價值觀並存的時代，而遺民們並非狹隘自固，不少人亦有容納不同選擇的理解力。（二）仕清者能夠利用其職位有效干預現實，和他們的交往，部分彌補了遺民無法在當世有所作為的缺憾。遺民對世事民生有強烈關懷，但身分的限制使其很難直接干預時政；想法的實施總是要依靠職權，顧炎武說：「韋布之士，僅能立言，惟達而在上者為之推廣其教，於人心世道不無小補也。」¹³⁵ 孫奇逢亦以此為仕元的姚樞、許衡、劉因辯護曰：「其為尊官也，方可以行道救民，奈何以此而苛求之？」¹³⁶ 政治立場固然是明遺民的立身準則，但他們並未因此而將天下視為「清廷之天下」而持旁觀者的冷漠態度，相反，他們保持著對國計民生的熱切關懷，這往往使其將看問題的視角從新朝與故國的對立轉移到有益當世：仕清者因而成為其寄望的中介。（三）「遺民」雖然亦是一種道德立場，但他們並不對全體社會成員都作同樣的要求，他們用以自律和律人的標準實際上有兩個。在群體內部，對故國故君的忠誠非常執著，不因時勢而遷轉；在群體之外，「君臣之義」的壓力可以用「移孝作忠」的權變來減輕，或者用把「忠」普遍化的方法將其分解為「各事其主，各忠其君」，勉強圓轉於儒家道德的範圍之內。並且，道德修養還有很多其他方面的內容，諸如仁愛、孝友、誠敬……都是雙方可以共勉互勵的。

不過，明遺民因為與仕清漢官的交往，在身前身後都承受著巨大的輿論壓力。他們雖然有所自辯，卻無法擺脫世人對其行為規範的預設期待。這種

133 顧炎武，〈與李星來書〉，《顧亭林詩文集》，頁63。

134 方文，《蠡山集》，頁1069。

135 顧炎武，〈與顏修來手劄〉，《顧亭林詩文集》，頁230。

136 孫奇逢，〈報白仲調〉，《夏峰先生集》，卷7，頁189。

期待儘管能夠幫助人們容易地理解其政治立場與道德理想，卻忽略了現實人生必然面臨多方面需求的生活常識。本文從不同角度進行事實清理，即為盡可能地重建明遺民當日立體人生圖景的一次嘗試。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清世祖實錄》，《清實錄》本，北京：中華書局影印，1985-1986。

清·方以智，《浮山文集》，《續修四庫全書叢書》集部第1389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2002，據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此藏軒刻本影印。

清·王夫之，《搔首問》，《船山全書》第12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

清·全祖望，《全祖望集彙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清·朱彝尊，《曝書亭集》，《四部叢刊初編》本，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

清·朱鶴齡，《愚庵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影印金閩童晉之刊行本。

清·吳偉業，《吳梅村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清·吳嘉紀，《吳嘉紀詩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清·呂留良，《呂晚村先生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4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6-1999，據南開大學圖書館藏清雍正三年天蓋樓刻本影印。

清·李元度，《清朝先正事略》，《清代傳記叢刊》第193冊，臺北：明文書局，1985。

清·沈壽民，《姑山遺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9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有本堂刻本影印。

清·卓爾堪，《明遺民詩》，北京：中華書局，1961。

清·周亮工，《賴古堂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據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清·侯方域，《侯方域集校箋》，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清·施閏章，《學餘堂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第1313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清·夏琳，《閩海紀略》，《臺灣文獻叢刊》第23種，臺北：臺灣銀行，1958。

清·孫奇逢，《夏峰先生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8冊，據清道光二十五

年大樑書院刻本影印。

- 清·徐枋，《居易堂集》，《四部叢刊三編》本，上海：商務印書館，1919-1936。
- 清·徐肅，《小腆紀傳》，《臺灣文獻叢刊》第138種，臺北：臺灣銀行，1963。
- 清·方文，《蠡山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 清·陳名夏，《石雲居詩集》，《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201冊，據北京圖書館藏清初刻本影印。
- 清·陳確，《陳確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
- 清·傅山，《霜紅龕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
- 清·彭士望，《恥躬堂文鈔》，《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2冊，據清咸豐二年刻本影印。
- 清·黃宗羲，《黃宗羲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4。
- 清·談遷，《北游錄》，北京：中華書局，1960。
- 清·鄧漢儀，《詩觀》，《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冊，據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慎墨堂刻本影印。
- 清·錢儀吉編，《碑傳集》，臺北：文海出版社，1980。
- 清·錢澄之，《田間文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
- 清·錢澄之，《田間詩集》，合肥：黃山書社，1998。
- 清·閻爾梅，《白舂山人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9冊，據中科院圖書館藏清康熙刻本影印。
- 清·歸莊，《歸莊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 清·魏禧，《魏叔子文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4-5冊，據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絨園書塾重刻本影印。
- 清·魏禧，《魏叔子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5冊，據清道光二十五年寧都謝庭綬絨園書塾重刻本影印。
- 清·顧公燮，《消夏閑記選存》，蘇州：江蘇省立蘇州圖書館，1939。
- 清·顧炎武，《顧亭林詩文集》，北京：中華書局，1983。
- 清·顧炎武，王蘧常注，《顧亭林詩集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 清·龔鼎孳，《定山堂詩集》，《四庫禁燬書叢刊》集部第117冊，據清康熙十五年吳興祚刻本影印。
- 趙爾巽等，《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二、近人論著

- 任道斌 1983 《方以智年譜》，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 陳 垣 2000 〈清初僧諍記〉，《明季滇黔佛教考》，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頁481-563。
- 陳去病 1999 《五石脂》，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馮其庸、葉君遠 1990 《吳梅村年譜》，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廖肇亨 1999 〈金堡之節義觀與歷史評價探析〉，《中國文史哲研究通訊》9.4 (1999.12): 95-116。
- 鄧之誠 1984 《清詩紀事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錢仲聯 1987 《清詩紀事·明遺民卷》，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
- 謝正光 1999 〈清初的遺民與貳臣——顧炎武、孫承澤、朱彝尊交遊考論〉，《漢學研究》17.2(1999.12): 31-60。
- 謝正光 2001 《清初詩文與士人交遊考》，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謝正光、范金民編 1995 《明遺民錄彙輯》，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
- 羅振玉 1999 《徐俟齋先生年譜》，《北京圖書館藏珍本年譜叢刊》第75冊，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ng Adherents and Qing Officials

Xuan Li*

Abstract

For adherents of the Ming dynasty, it was very difficult to avoid associating with Qing officials. The two groups were connected in many aspects, such as previous friendships, family relationships, a common enthusiasm for academic research, etc. Despite conflicting political positions, their associations remained intact. Ming adherents even admired Qing officials for their outstanding achievement in improving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Even so, public opinion regarding their relationship added a great deal of stress to the lives of these adherents.

Keywords: Ming dynasty adherents, turncoat officials, Qing dynasty, Gu Yanwu
顧炎武, Fang Wen 方文, Wei Xi 魏禧

* Xuan Li is a lecturer in the Institute for Non-orthodox Chinese Culture at Sichuan University.